

今年2月15日是徐中玉先生一百零二岁生日。这一天艳阳高照,风和日丽,我上午打电话到徐先生家,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一连拨打了三次,都无人接听,怎么回事?

过了半个小时,电话终于接通了,徐家保姆胡金花接了,原来,她出外买菜去了。我问起徐先生近况,她笑笑说,他现在听不了电话,但身体蛮好,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呢!我说:“我们一会儿来给徐先生过生日!”

我约了文友何鑫渠。2001年初春,我们两人曾陪徐先生去杭州游西湖,当时徐先生已八十六岁,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胡庆余堂(鑫渠在胡庆余堂工作)。午餐后,我们怕徐先生累,安排他睡午觉。不料八十六岁的徐先生精力充沛,毫无倦意,他在西湖边漫步,也不要人搀扶。

这次我们赶到徐先生的寓所,才发现他真的老了。记得我三年前见到徐先生时,他还看看报、动动笔墨,可现在他却坐在藤椅上打瞌睡。保姆叫了声“爷爷!”徐中玉这才抬起头来。他脸色还是那么红润,脸上有依稀可见的老人斑,他笑了笑,表示欢迎。

我拿出徐先生当年为我编的版面写的“读书乐”题字,他认出了自己的笔迹,又咧开嘴笑了。

听保姆说,徐先生的两个儿



徐中玉先生在看作者写的祝寿词。曹正文摄



本文作者(右)与徐中玉合影。何鑫渠摄

子都在美国,今年她回安徽老家过年,七十三岁的小儿子从海外赶回上海陪老父亲共度佳节。她又说,徐先生每天的生活大致如此:早上七点起床,早餐是牛奶、麦片加鸡蛋,她把多种维生素与蛋白粉泡在牛奶麦片中。然后是看电视。徐先生这两年衰老很多,已不看报纸了,他在三年前还看看报上的大标题。午餐是吃饭,佐菜是虾仁、鱼圆或鱼片。然后睡个午觉。天气暖和,有阳光的日子,

保姆会搀扶徐先生坐上轮椅去附近的长风公园。在那里,徐先生还常常遇到他的老同事、老邻居钱谷融先生。钱先生已九十九岁,但他每天会拄着拐杖在公园中走一个多小时。钱先生每次看到徐先生时,会握握徐先生的手,徐中玉又会怡然地笑了。晚餐吃汤圆或粽子,青菜、萝卜等蔬菜,几乎每顿都有。每天还吃一些水果,如猕猴桃、橙子、香蕉等。晚上九点睡觉。

保姆说:“爷爷不挑食,他在一百岁时装了全口假牙,吃东西还行,胃口也不错。”

我们说,徐先生,我们今天来给你过生日,徐中玉先生又笑了。据保姆说,街道还为徐先生拍了照片,徐先生听到了,他把头转向五斗橱,目光停留在那几张照片上。我们在向徐先生祝寿时,他说了不少话,但我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保姆在旁“翻译”。我从他的神情中猜到他很高兴,他不时

地变换表情,表明一个百岁老人的心理活动。

徐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虽然没在课堂上听他讲过课,但我是华东师大自学考试毕业生,读的是他主编的《大学语文》,徐中玉先生还是华东师大高等自学考试委员会主任。我自1984年起就认识徐先生,在各种会议与笔会上与他见过十几次,我在执编“读书乐”的二十二年中,几乎每年都去徐先生家请教。他不仅为我写了十几篇读书随感与书评文章,而且还承他鼓励,为我撰写的《米舒书话》《我说风月无边》两本小书写了序言。他对我们这一代后辈编辑寄予厚望,让我这辈子永远铭记在心。

记得“读书乐”召开一千期的座谈会上,九十二岁的徐中玉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与赵启正同志为获奖者授了证书,这一幕犹在眼前。而十年后的今天,徐先生说什么话,我们只能靠猜测了。但一个一百零二岁的老人能在家中过生日,自己安闲地坐在藤椅上快活地微笑,本身就是个生命的奇迹。

从限制性移民政策中窥见文学之变

■苏少伟

文学是独立的,但文学作品的内容却无法隔绝政治、社会等场域内的活动;相反,它有时会深度牵涉其中,以表达人的“存在”问题。从这条原理出发,笔者想谈一下近日美国的一项政治决定有可能带来的文学反应。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最近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令,对部分中东国家移民进行限制。看到这一禁令,笔者想到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要而言之,两者是很相近的。特朗普行政令规定:即日起一百二十天内,暂停接受难民;在九十天内,暂停接受来自七个中东国家持普通签证的公民。因法院抵制,目前已暂停实施这一行政令。《排华法案》规定:十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包括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矿工。凡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都可以美国法院的命令驱逐出境。前者导致的结果是:以上七国公民中的绿卡持有者,需要逐个接受审查才可入境。大批利用假期回国的旅行者,即使持有有效签证,也无法再次入境继续在美国的工作和学业;而行政令颁布时已经坐上了飞机的七国公民,则在落地美国之后无法入境,只能滞留机场,并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而后者造成的后果是:工人以外的所有中国人入境,须有中国政府所发的英文证书,内载有关该中国人各种事项,并证明该人按照条约规定有入美的权利。中国政府所发证书必须经出口港的美国领事查验和签名盖章。但入美境后还须由美国海关人员查诘一遍,若海关人员认为不能入境,还要被驱逐回国。

当然,笔者想讨论的重点不在政治,而在于文学,在于这样的行政令对美国文学可能带来的新变化。回溯历史,1882



年的《排华法案》实施后,给华裔美国人带来了新问题。对此,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确实作出了反应,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

第一,是苦闷的文学。《排华法案》规定,入美华人需要接受审查,地点在天使岛。华人滞留于此,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他们的身体遭受拘禁,精神更为压抑。“物不平则鸣”,苦闷在心,发而为声。他们在拘禁所的木板上,刻下了一首首诗歌,这是《埃仑诗集》的由来。我举其中之短文《木屋囚囚序》中的一个片段,以此探讨这类诗歌的内容表达及艺术风味:

呜呼!白种强权,黄魂受惨。叱丧家之狗,强入牢笼;迫入笠之豚,严加锁钥。魂消雪窖,真牛马不如;泪洒冰天,洵禽鸟之不若也。但我既甯海曲,性品悦看报章。称说旧乡故土,豆剖瓜分;哀怜举国斯文,狼吞虎噬。将见四百兆之华民,重为数国之奴隶;五千年之历史,化为印度之危亡。良可慨也,尚忍言哉?

我们看到,“木屋楚囚”是《排华法案》实施后的新现象,前所未有,叙写了一整

代华人移民的精神之殇。它的影响在以后诸位华裔作家中,比如汤亭亭、赵健秀、徐忠雄等人身上都有折射。这样的创伤存在于当事人,甚至以后几代人的心中。文学记录了他们的遭遇,叙述了其凄然的心境。

第二,是“契约子”(Paper Son)现象。“契约子”是特定的历史产物。美国行政当局禁止移民,但允许在美华人的亲属投奔。因此,有些华人不得不假借是在美华人的儿子,通过一纸证书,改名换姓,进入美国。但是,这样的“契约子”入境后绝非自由,他们失去了自我身份,甚至经常担心警察等当局势力的盘查,因此俨然成为地下分子。大多数“契约子”不敢离开华人社区半步,藏于斯、老于斯。精神的苦痛,自不需明言。我们可以在很多华裔作家的作品中看到这类人物,比如布鲁斯·爱德华·何(Bruce Edward Hall)的作品《茶壶烈酒》(Tea That Burns)。而笔者认为,此类作品中写得最好的是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骨》(Bone)。小说中的利昂就是一个“契约儿”,没有工作,他在唐人街的生

存状况就像长久躲避光亮的老鼠,没有自我。他的家庭也是破碎的,充满了悲剧性。小说中的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现实无力感。笔者甚至觉得,这个小说人物是一个象征,他是一个种族团体的代表,他的精神压抑,甚至异化等都显而易见。

第三,在美华人受到直接冲击。笔者不否认,《排华法案》实施之前,就有攻击华人的现象存在,但是,法案实施后,更助长了这股歪风。华人的身家性命、居住之所、自由之权等,毫无保障。一定意义上说,水仙花的《一位欧亚后裔的回忆书笺》、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汤亭亭的《中国佬》等都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有所揭露。笔者想具体以叶翔添(Laurence Michael Yep)的《龙翼》(Dragonwings)为例。文本描述了这样的情节:

就在此时,我们听到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左窗玻璃已被打破,碎玻璃撒了一地。砖头飞进来时,我紧靠右窗站着。我盯着砖头滑过干净的破旧木地板。我听到外面一阵讥笑和叫喊……我不知道他们在吼什么,但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放火、抢劫,想打人……父亲的拳头攥紧了又放开……叩掌叹了口气,“但愿他们这次会玩腻了(而放过)我们”。

这里就很形象地揭示了族群矛盾对社会建设与个人心灵所造成的伤害。更进一步说,人文、伦理、秩序等在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长久存在。

当然,任何一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其产生的后果是结构性的,要将其一点一滴地理出来,是比较费劲的。因此,笔者在这里只是举其大要。

有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确实是有部分道理的。无论目前的总统行政令是否实施,实施后会持续多久,它所造成的创伤都不可能轻易抹掉。我们不能肯定,美国国内的文学文化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内容、新的变化,但我们都懂得一点,平等与人道的精神才是最值得珍视的。这也是我们对文学、社会的一种期许。